

利在千秋：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申遗回眸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当地时间6月22日上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请通过现场审议，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4年6月22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渠道，中国大运河进入世界的视野之中。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10周年。大运河济宁段申遗工作，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在接受《文化周末》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重要城市，济宁做到了“五个第一”。

一是在2001年正式提出“关于把保护修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纳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总体规划的建议”，揭开了全国大运河保护申遗的序幕；二是在2003年率团全程考察运河，呼吁沿线城市联合申遗；三是在2004年“中国大运河第二届文化艺术节”上，促成沿运河18个城市达成联合申遗共识。“这‘三个第一’比罗哲文等‘老三’2005年写信给18位运河城市市长，呼吁联合申遗分别提早了4年、2年和1年。”杜庆生说。

2006年5月，杜庆生代表济宁市参加全国政协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并作专题发言。之后8年，杜庆生全程参与了大运河保护申遗和运河文化研讨的各项全国性活动。

杜庆生提出的“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是最好的保护”的科学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在最终促成大运河成功申遗和后申遗时代

大运河科学保护方面作出积极贡献。杜庆生认为，作为一个社团组织，这应当是又一个第一。

第五个第一是：运河济宁段列入的遗产点共11处，是单个运河城市入选最多的。如今的济宁已经坐拥两项世界文化遗产，一座文明古城又有了新的提升知名度的砝码。

杜庆生分享了他对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几点感悟。杜庆生表示，在大运河申遗成功与否的问题上，他一直持淡定的态度。

“因为在我的理念中，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更主要的是，中国大运河太伟大了，不论什么世界组织都没有任何理由把她拒之门外。”杜庆生说，早在2006年6月5日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中就讲到，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历史，不研究运河文化是不行的。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京杭大运河，至今仍被排除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外，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遗憾。

尽管大运河申遗一波三折，但最终成功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是情理之中的。

其一，从时空的角度看，大运河肇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到现在已有2600年的历史。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成为我们国家历史文明的记录和象征。

其二，从发挥的作用看，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流动的、活着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

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其三，目前已有5项国外运河及其相关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的4条吊桥、加拿大里多运河、英国旁特沃斯泰水道桥与运河和荷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但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之后开凿的运河，历史仅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无论从时空跨度、历史价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科技含量，它们与中国大运河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大运河在世界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这个8年多的时间里，杜庆生对运河成功申遗始终是信心满满的。

在大运河申遗的全过程中，杜庆生一直强调：从我做起是基础，全线贯通是关键，首要任务是保护。杜庆生特别强调了对大运河申遗的看法，申遗不是目的，申遗成功与否也不是最紧要的事情。申遗是一个过程，通过申遗唤醒全社会的保护意识，推动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把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切实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才是我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现在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杜庆生说，今后的任务是，以申遗成功为起点，更好地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遗产，当然最重要的仍然是保护。

“这次申遗，全国8个沿运河城市共列出申遗项目58个，济宁12个，占20%还多一点，包括9座闸、2座桥、1个坝，任务相当繁重。”杜庆生回忆道，济宁市和运河文化研究会为大运河申遗付出了艰苦努力。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县

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公园的建设，光居民就搬迁了800多户，当地党政领导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广大群众顾全大局，自觉自愿地服从安排，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一直在酝酿大运河申遗的问题。2004年，中国京杭大运河第二届文化艺术节在济宁举办期间，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促成沿运河18个城市达成运河联合申遗的共识。2006年6月5日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杜庆生作了“为大运河保护申遗进言”的专题发言，重点就保护修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进行了呼吁。之后，连续进行了10年的工作，终于进入国家决策程序，并成为大运河申遗的一个重要节点。

杜庆生认为，申遗成功为大运河的保护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一是可以激励全社会更加珍惜运河、自觉保护运河，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运河航道等提升城市建设水平，进一步利用好这笔宝贵遗产。同时，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让中国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了解中国，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认同感。作为济宁，要把申遗成功作为新的起点，更加自觉地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运河，传承运河文明，建设美丽济宁，让老祖宗留下的这笔遗产继续为济宁人民造福。

运河边的那座排灌站

田守勇

这是济宁城南运河西岸一座废弃多年的小型排灌站，1970年入秋始建，次年春夏之交竣工。村里人对出工建站的期望和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一个新生男孩就取名“建站”。

我的父亲参加了修建的全过程，刚过门儿半年多的母亲也参加了疏浚沟渠的劳动，茶余饭后他俩常有一搭没一搭地提起和感慨。

排灌站规模不大，上下两个方形蓄水池，石头砌成，下面深五六米，四四方方，通过大干沟与运河相连。大干沟近百米长，比河床要深些，两侧陡峭深滑，水岸层层叠叠的芦苇，水中堆积着密集的草茎，黑黢黢的，显得愈发幽深，从堤下面穿过来连通运河与蓄水池。

蓄水池上建成红砖青瓦的泵房，里面3组水泵平行排列，分别连接着3根大约1米粗的水管，一节套着一节，伸至下面的蓄水池。抽水时，机器轰鸣，锅盖般的三股激流喷涌而出，汇集到上面的蓄水池，湍急旋转，飞溅乱流，再通过闸门和上水渠奔流向西，纵横交错的沟渠流到各家田地里。

泵房里除了3组并列的机器，角落里杂乱地堆着一张床铺和铺盖、锅灶等物，那是护站人吃住的地方。他们都是本村的，一般两人一组，主要是管泵房里的电闸。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儿，就在地面上铺几张草席，伴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和高频率的地面震颤，天南海北地胡侃，打扑克喝酒。那是村里一些人聚在一起消闲解闷的地方。

排灌站旱时抽水灌田，涝时排水防灾，像一位勤勉尽责的守护神，精心滋养着农田、村庄和上千村民。那些年，每次从村子里听到泵房里传来机器转动的熟悉声音，就像是听到亲切的召唤，我们小孩子就三三两两跑向村子东北角，那条通向河堤的乡间土路，汇集到排灌站的身边。

这些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西南平原上的农村小孩子，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广袤的乡野无拘无束地奔跑，毫无顾忌地嬉戏，任性得要命，大自然为我们铺展了一切活动的场所和背景，村庄、田地、运河……，密密匝匝的河堤槐树林，绿畴如画的田野河坡，交织如蛛网的水塘沟渠，浓荫蔽日荒草披拂的乡间路，都是我们放飞的辽阔舞台。

排灌站，特别是上下两个蓄水池，更是我们一年四季的乐园，它像一根拴马桩，系着我们野性的缰绳，在那里一直玩到村子方向传来父母叫回家吃饭的呼唤。

那时候的河水丰盈清澈，蓄在一方池中，晶莹剔透，清可见底，那是夏天的游泳池和冬天的溜冰场。下面的蓄水池水深且凉，两三米深处紧贴着一侧修了一个平台，全是石头铺的，把池子分成上下两层。水多时淹没平台，水浅时露出石头，游泳累了就在平台小憩。

坐在台上，脚伸在水中，看同伴们在池中泛起一朵朵浪花。水池的一角是由上伸到池底的台阶，即使不会游泳，也能站在台阶上，掬一捧水浇在身上，体味那份瞬间传遍全身的清凉。

泵房正好探在水池正上方，房顶离水面四五米的样子，伙伴们顺着水管和墙角能攀到房顶，或头朝下斜着俯冲，或捏着鼻子双腿蜷曲蹲着跳下，都把房顶当成跳水台了。于是整个夏天的排灌站，一个个赤条条的身影从高高的房顶以各种姿势投入蓄水池，一个接着一个，或者几个人同时跳下，水池中掀起一朵朵饱满的水花，露出一个个调皮的脑袋。

常有村里人登上房顶修缮补缺，换下踩碎的红瓦，补葺一些水泥，却很少有人喝止我们向房顶的攀爬。看护泵房的人，有时还蹲在一边看我们一个个攀上跳下，津津有味地观赏点评，像是在看一场好电影。

几乎在整个冬天，排灌站都是闲着的。那时上面的蓄水池是干涸的，下面的被冰面封住。我们还是常到排灌站来，穿着千层底的棉鞋滑冰。有时捡起砂砸投到冰面，随着低沉的回声，砂砸穿透冰面沉入水底；或在冰面上留下白刺刺的印痕，快速旋转，堆在冰面的一角。

上了初中我就离开村子，以后经年辗转求学，并在异乡安居，以至于不知道排灌站什么时候停了，什么时候废弃了，多少年没有见上一眼，也想不起来去看一看，只是偶在回忆中残存一些排灌站的背景和画面，像是一张浸染了岁月汗水的发黄照片。

一个秋初的周末回到老家，傍晚出来村子，向东沿着小道信步走上河堤。傍晚归巢的鸟，密密麻麻，叽叽喳喳，但新植的白杨，已无法像几十年前的槐树林那样，承载倦鸟归来的筑巢和休憩。

沥青路面覆盖了沙土路，踩上去硬邦邦的，有种凝固的回响。避开来往的汽车和电动车，我走到外环路边的一个斜坡，树从中几间低矮的砖房后面，竟然是那座排灌站，在外环路与滨河路交叉口处的纷繁喧嚣中，它倔强地矗立在那里。

运河的改造以及河堤的增高，使排灌站俯低了身姿，泵房的屋顶几乎与堤面齐平。站在河堤上，排灌站那座经过改建的泵房和前后两个蓄水池，还有两根电线杆中间的电机和纵横交错的电线，灰头土脸地出现在眼前，正被渣土和树枝蚕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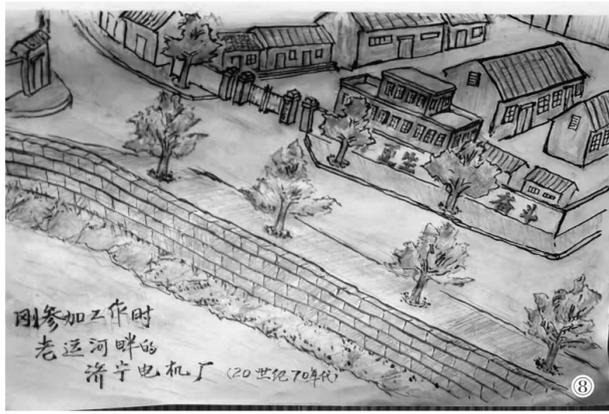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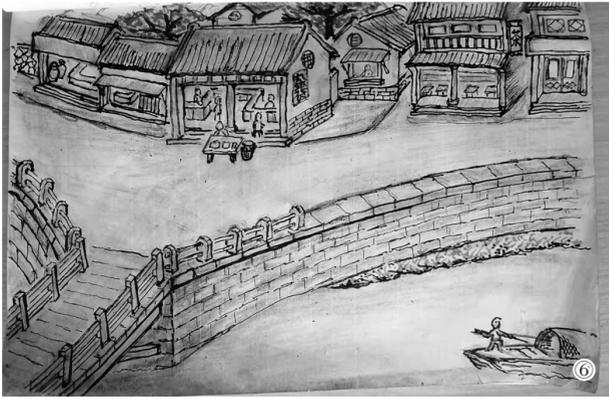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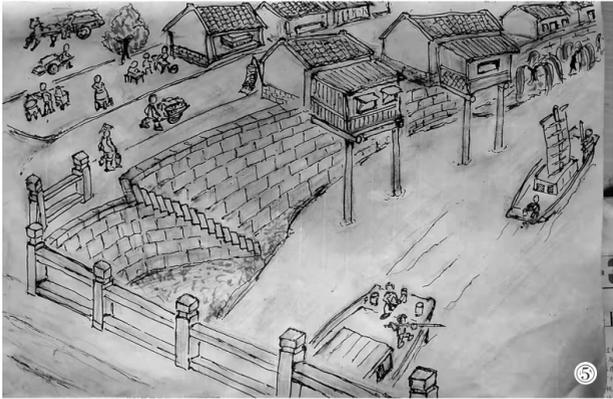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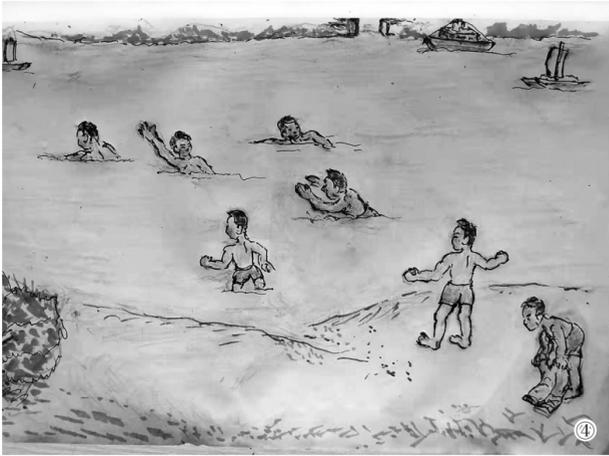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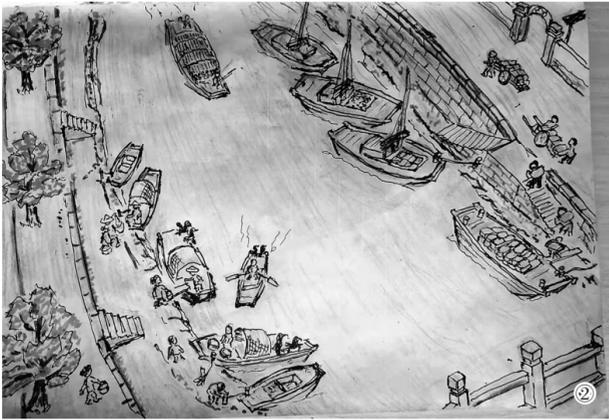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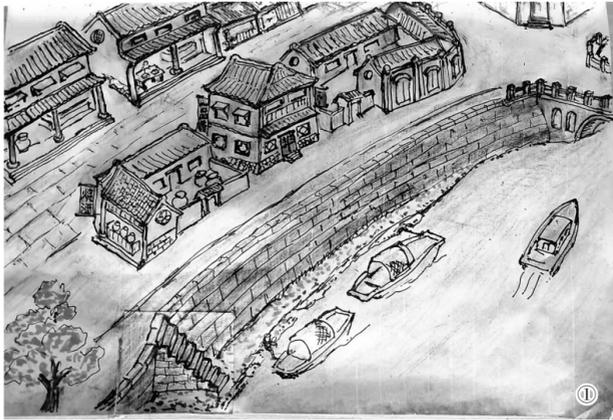
近半个世纪了，排灌站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像一位历尽沧桑又精力枯竭的老人，蜷缩在风烛残年的破败与荒凉中；又像一枚凋零的白杨树叶，孤独地落下，卷边发干，枯萎，融入泥土。但在我执着的内心，那3组水泵依然会倔强地轰鸣，那3道水柱依然会执拗地倾泻，一如以前那样，缓缓地流淌在我的童年记忆和整个村子的每条血管。

我站在斜坡上长久地凝视，我应该想起它，每一次回到老家应该走上几步来看它一眼。它曾经刻画了我的童年，依然在妆点我的人生。在我的心目中，废弃多年的排灌站，无异于一座温热有感知的纪念碑。它站在那里，告诉我们一段过往的岁月，让我们从它走进历史的深处。

1960 至 1970

济宁老运河记忆

梁方苏 绘



- ①南门桥南烧酒胡同的一品香饭店和百货店
- ②小闸口桥南坝口码头的粮船和渔船
- ③南门桥西剪子股街渡口
- ④在大运河游泳的孩子们
- ⑤南门口桥东北角的沿河饭馆、酒馆
- ⑥大闸口桥头正南的杂货店铁匠铺等
- ⑦小闸口桥头东百货二部、济宁电机厂南厂
- ⑧位于老运河河湾东的济宁电机厂

刚参加工作时的老运河畔的济宁电机厂（20世纪70年代）